

共同富裕实现的资本逻辑与路径探赜

李楠 李昀励

摘要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资本既表现为一种追求增殖的价值即资本一般,也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特殊,具有正反双向的二重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是体现马克思有关资本一般性同特殊性相统一规定的一类经济范畴,其中公有资本所有权归全体人民或集体,是共同富裕的压舱基石;非公有资本作为以私有生产关系为本质的资本,既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驱动力,亦会在监督与引导不足的情况下无序扩张,悖逆共同富裕的民生指向。当前,明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属性,并聚合各类资本合力以促进共同富裕,是理论与实践领域的重点关照。新发展阶段,持续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服务共同富裕大局,一方面要坚持公有资本主导地位,发挥其全局调控功能,增进其民生担当,充分展现其领富效用;另一方面要鼓励非公有资本发展,引导其服务民生福祉,坚决遏制其无序扩张,充分展现其促富效用。

关键词 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资本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4-001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18)

资本的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休戚相关。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P24)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关键指标之一提上了重大议事日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引导其有序发展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2]。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在当前加快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资本的本质特性,引导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坚决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调动资本活力极大迸发,是党领导人民走好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关键环节和必要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资本的辩证意蕴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资本具有追求增殖的价值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定义。马克思始终致力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辩证、科学地看待资本,将其视作一个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的矛盾综合体,既对其文明性正面禀赋予以肯定,亦对其野蛮性逐利特性予以批判。

(一) 本质把握:价值与关系的双重建构

马克思从一般规定性与特殊规定性相统一的视角,深刻揭示了资本所具有的双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将资本定义为追求增殖的价值。马克思指明,“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而实现的量方面的程度。”^[3](P397)“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

造利润的使用价值。”^[4](P384)具体在其外化形态上,资本呈现为一类具有黏合剂效应的必要生产要素,能够通过将各类要素集聚至生产过程中并予以组合配置,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自身增殖。能否孕育剩余价值乃是判别资本的唯一标尺,“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产生剩余价值,从而增殖价值时,才变为资本”^[5](P587)。在马克思看来,自发性谋求剩余价值的积累与价值的增殖乃是资本本质的根本性规定,非此则不成其为资本。以此为基础的资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价值增殖是其发展的首要目的与根本动机,“这个资本购买劳动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自行增殖”^[6](P305);第二,它对价值增殖具有无止境的长期追求,“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7](P305),“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8](P871);第三,它唯有借助一定的运动过程方可实现增殖逻辑的自洽,“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9](P122)恰是经由购买、生产、销售这一空间并存、时间继起的循环往复扩大再生产的运动过程,资本的价值增殖追求才能够实现。作为增殖价值的本质乃是马克思对资本的一般性规定,即“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7](P440),这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各类资本运动的充分归纳总结基础上所抽象出的资本一般。

第二重含义将资本定义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0](P784-785),由于资本并非抽象存在物,具有相应的归属权,其所有者均处于由所有制所决定的经济关系中,故资本必然承载着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通过对雇佣劳动这一价值增殖源泉的深刻剖析,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价值增殖过程相联系,科学地洞察到资本的这一隐秘本质,即掩盖于物和物交换关系之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3](P922)。因而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不仅具备一般性规定,更是具备在不同的国情与社会制度下产生异质化社会属性的特殊性规定,既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亦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服务对象、运动规律与功能特性相应会存在根本性差异。马克思所尖锐批判的正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资本特殊,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制度下,资本体现为一类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剥离为主要表征的私有制关系,是被物的面纱所遮掩住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间剥削、被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11](P46)和“普照的光”^[7](P48),对经济社会拥有庞大的支配力量,其生产过程造就了资本主体同生产主体的高度背离,“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7](P480),非但塑就了人与人间剥削、对立的关系,更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与主体性的沦丧。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资本特殊乃是建立在公有资本主体之下的,致力于人民利益、经济利益及社会效益最大化统一的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生产关系,其资本主体同生产主体具备强一致性,这一关系体现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即需要同满足需要的生产关系;体现在人民与执政党之间,即血脉相通的社会关系^[12]。

(二) 正面禀赋:资本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马克思在剖释资本特性的过程中,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肯定了资本所具有的正向作用。

首先,资本推进了传统社会的转型升级。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0](P159)资本的诞生乃是相较等级制社会的历史性突破,它将久经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拉出了封建制度的桎梏。随着资本逻辑的铺开,传统社会关系日臻重塑,传统等级观念的消融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剥离使生产者卸下了隶属地位与行会的枷锁,成为不受政治及宗教奴役、具备高度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此即马克思所言之资本文明面:“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P927-928)

其次,资本拉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进步。以循环往复运动实现价值增值为本性的资本,出场后非但继承了母体封建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更是在此基础之上最大限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

财富的积累。在资本的黏合剂效应下,各类生产要素有机耦合入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结构性、整体性效益,最大化扩张了生产力总效能与社会再循环,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这一史无前例的巨大发展速度连马克思恩格斯亦感到颇为震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P36)同时,随着资本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 and 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4](P359)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为科学技术赋予了生产财富的使命,使自然科学开始服务于生产过程,反之生产的发展同样为科学理论的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新生产力的创造开辟了快速通道。

最后,资本助益了人类自身主体性的质化提升。与资本的不断扩张同步发展的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大力开掘,社会成员的相互联系程度与自然界的改造广度日益深化,藉此人类跳出了盲目崇拜自然的蒙昧时期,开启了征服自然的新阶段,“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7](P389-390)。同时,纵使并非资本本意,其对源源不断创造新需求、将必要劳动降至最低限度的孜孜以求客观上打开了人类需求的闸门,使人拥有了远逾传统社会局限性认知的丰厚需求,并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4](P199),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即如马克思指出的:“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7](P389)

(三) 负面特性:资本带来社会无序与人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天然就是利润的忠实追逐者,它“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8](P269)。这表明资本具备天生的贪婪性与投机性,恣意发展的资本会将其内在矛盾性逐步侵入人同社会、人同人间之间的矛盾之中,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的福祉带来极大负外部性。

首先,资本催生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指出,恣意发展的资本具有高度贪婪的属性,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最为突出的体现:“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P871)无限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盲目性、无序性贯穿于资本运动逻辑的始终,如此非但会导致微观层面上产品供给同社会需求间的无序失衡,更会在资本运行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导致一定的、交换及再生产赖以常规运行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16](P557),进而扭曲社会的正常生产循环,导致宏观层面上经济结构的紊乱。随着后期资本形态的进一步变异,诞生了以投机性、虚拟性为主要表征的金融资本,其以飞速膨胀的支配权瞬间扩张至世界各地,导致“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6](P67-68)。金融资本市场在各类金融衍生品的急速扩张下已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信息革命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有机组成并使金融运作变得‘无法控制’。在7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电子金融交易超过中央银行储备的大约7倍。”^[17](P640)金融资本的收益源自对产业资本利润的挤占剥夺,紧扣“以钱生钱”逻辑,相较产业资本具有更为强劲的增殖效应,然而一旦它的收益增速超过实体经济增速,泛起的金融泡沫就成为一颗埋藏在资本逐利狂欢盛宴下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导致一场破坏力巨大、波及面广泛的持续性经济危机,这从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即可见一斑。

其次,资本造就了人的异化与社会的两极分化。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求要求其始终无止境地扩张,片刻不停地藉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偿吮吸人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绞尽脑汁将人物化为资本的附庸、机器的附属,使劳动力、人格、良心、名誉和身体等属于人的特质的东西,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物化不断加剧^[18],不断将劳动者拉入贫窘的深渊,导致人的发展危机日益加重。即如马克思所言:“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8](P743-744)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坐拥可以不断“滚雪球”式积攒财富的资本,而“自由”的工人阶级仅仅拥有无法积累的劳动要素,长此以往,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日趋尖锐。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生产形式的变化与福特制生产、机械化应用等分工形式的协调与配合,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亦具有了更为隐蔽的形态,暗藏在相对工作时间减少、大量工会改良措施、社会福利政策及部分“高级”雇佣劳动者的丰厚薪资背后的仍然是资本永恒的逐利逻辑,劳动者福利待遇改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资本雪球的卷席速度,其福利待遇愈优渥,愈代表资本在攫取社会财富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两极差异即在资本温情面纱的掩饰下愈拉愈大。诺贝尔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恰印证了这一点:现时“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19](前言P10)。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不断反思计划经济体制弊病的过程中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承认了资本范畴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使用“资本”范畴,我国正式承认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随后,党的十五大首次将资本列为生产要素之一,正式承认资本同劳动力、技术一般都是推动经济生产的重要力量,并提出“公有资本”之概念,塑就了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间的张力结构,初步夯实公有资本对非公有资本的主导性地位。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纳入社会主义的资本范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提出要大力发展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至此,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不仅涵盖民营资本及外国资本等非公有资本,亦涵盖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同时还涵盖由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混合而得的混合资本。以上一系列资本范畴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营机制之中,既公平竞争,亦互补互促,一并助推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运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铸就坚韧基石。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其在“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具备无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性^[20]。鉴于此,充分厘清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资本的特性与效用,明晰各类资本在促进共富进程中的关键任务,对于更好地发挥资本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效用而言极为必要。

(一) 公有资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压舱基石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是体现马克思有关资本一般性同特殊性相统一规定的一类经济范畴,其中,公有资本是承载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资本特殊,其所有权归属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或集体,外化形态具体囊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同混合资本中的国有成分及集体成分。作为一种资本,公有资本亦天然具备资本一般的属性,致力于以增殖逐利为逻辑、以社会总资本运动的一般流程为遵循,无休止循环周转、扩张运作,具有一定的分散自发性。但由于公有资本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具备独特的社会属性,服务对象为全体人民,运动规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功能价值为谋求共同富裕,故而能够最大化克服资本一般的原生弊端,使对价值增殖的追求不再是其最终目的,而成为其谋福于民、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多年来,我国公有资本为推进共同富裕事业行稳致远发挥的积极效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公有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力铸就了共同富裕的“富裕”根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为实质的公有资本,其增殖与积累直接代表着公有制经济实力的壮大,亦代表着国民全体拥有的财富总

量的增长。同时,公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性力量,通过自身的不断增殖能够带动生产管理技术的优化与市场空间的拓展,并能凭借自身在集中使用资源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对经济调控的参与中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保障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公有资本在保障自身积累发展的过程中更是能够同非公有资本相结合,藉由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导驾驭非公有资本,科学规划资本投资方向,最大化撬动非公有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促进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21],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铸就坚实物质支撑、提供强大经济力量。公有资本的主体承载形式为国有资本,在这方面,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规模的日益扩张,国有资产增值幅度明显,缴纳税额大幅提升,大批国有企业迈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208.3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达86.9万亿元,缴纳税额5.4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2],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效用。同时,2021年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143家中国企业中,95家为国有企业,49家为中央企业,分别占上榜总数的66.4%与34.3%^[23],打造了我国公有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在集体资本方面,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21.9万家^[2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达7.7万亿元^[25],为农民共同富裕步伐的持续迈进提供了坚实支撑。

其次,公有资本的公共特质充分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共同”属性。一方面,公有资本增殖价值的全民共享性是其保障人民享有富裕生活的基本依托。公有资本由全体人民集体共同拥有,体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生产关系,其积累与增殖均用以促进共同富裕,劳动者平等享有其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26],具有实现剩余共享、相对公平分配的良好条件。在公有资本增殖价值的分配中,其首先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在初次分配中以工资形式向劳动者提供直接价值补偿,剩余部分的价值则以企业再生产、福利基金与缴纳税款等形式保留,并随后在再次、三次分配中以各种形式向劳动者提供间接价值补偿,实现劳动价值向劳动者自身的回归。以初次分配为例,2021年,全国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15583元,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74491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仅为62884元,仅占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4.4%和84.4%,公有资本的全民所有权决定了公有单位的劳动者能够最大化获取价值补偿。另一方面,公有资本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它具有服务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国家政策部署的总体框架之下运行的公有资本是民生战略的忠实支持者,在以往的脱贫攻坚工作中,为打造扶贫资本运作平台、凝聚多方合力扶贫作出了不菲贡献。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国资委与中央企业定点帮扶248个,前后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千亿元。其所设立的央企扶贫基金共完成投资决策项目118个、投资金额307.07亿元,累计引导撬动社会资本约2600亿元^[27]。同时,公有资本对社会保障事业的稳定运行亦有所助。为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2020年底,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全面完成,以国有股权10%的比例一共划转1.68万亿元^[28],有效保障社保体系可持续性运转、促进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最后,公有资本的先锋作用牢牢托住了共同富裕的“稳定”底盘。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大局稳定是基础性前提。公有资本由于运动流向与规模受国家宏观调控与战略规划所影响,具备高度服从性与引领性,身兼经济、政治、社会的多维度职责^[29]。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我国充分发挥公有资本调控市场走向、稳定经济大盘的作用。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536亿元^[30],为我国克服金融危机影响、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维持经济较快增长起到了关键效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公有资本不遗余力、不计成本地投入各地医院的专项建设改造项目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抗疫设备物资生产、疫苗研发等供给保障,同时积极引导与响应各类减免优惠政策,大大降低社会运转成本,有效保障就业大局稳定,成功完成促进经济恢复多项任务,为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达成、共同富裕事业的稳定推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非公有资本: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非公有资本是与公有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是代表着具备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特征的

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资本特殊,外化形态为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及混合资本中的非公有成分。其产权具有私人所有性,服务对象为私人主体,微观上遵循私人剩余价值规律,致力追求私人资本的无止境增殖与盲目扩张。但由于非公有资本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公有资本的主导之下运行,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政策的约束与公有资本的引导与影响,故而其总体运动规律亦具备社会主义属性,在追求价值增殖的同时需要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相适应,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公有资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存在根本性区别,能够成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引导力量与公有资本的强势主体地位使得非公有资本能够具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多元化力量的积极特性。

首先,非公有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能够为国民经济谋求跨越式发展。非公有资本具有无限追求增殖的天然本性,为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往往致力于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加之其兼具投入低、利润高、效益强、增长快、运行活等多项优势,能够最大程度解放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国民财富,多年来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量作出了70%-80%的贡献^[31](P339)。从工业领域这一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来看,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私营工业企业和港澳台商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资产总值达688481.7亿元,利润总和54569.9亿元,分别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和的48.7%与利润总和的62.7%^[32]。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非公有资本为全体人民共富征程的推进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资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90%以上的企业数量”^[33](P4-5)。

其次,非公有资本作为国家政策的必要遵循者,能够为人民群众谋求共同之福祉。非公有资本在国家的科学引导与统一调控之下,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秉持与公有资本一致的运行目标,承担起相应的工具性职责,服务国计民生战略的规划,积极参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创造。在脱贫攻坚期间,我国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12.7万家,精准帮扶13.91万个村;产业投入1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4亿元,安置就业90.04万人,共带动和惠及1803.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慈善捐赠方面,2020年,我国内地接受款物捐赠共计2086.1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的贡献占比51.79%^[34]。诸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非公有资本为广大人民得以充分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作出了不菲的贡献。同时,非公有资本的发展带动了大批就业岗位的创造,多年来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33](P4-5),为满足人民的多类型就业需求、扩大社会就业再就业、使广大群众勤劳致富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肯定非公有资本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意义时,亦需提防其可能产生的分化效应。非公有资本的私人占有决定了它仍然具有私人生产关系的性质,纵然当前大部分非公有资本主要通过合法方式实现自身对价值增殖的追求,但尚存在部分非公有资本在缺乏有效监督与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试图以垄断、不正当竞争及侵犯劳动者权益等违规行为实现无限增殖的无序扩张乱象,干扰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

首先,过度自由的非公有资本在金融化与平台化的新发展中,易滋生金融泡沫,产生平台垄断,损害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在金融化过程中,若未得到足够的监管与规范,秉持逐利本性的非公有资本会藉由各式目不暇接的经营运作,无限制加大杠杆、扩张信用,并从中获取极为丰厚的利润,而与此一并带来的则是金融风险的不不断积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同时,随着数字化新兴产业的蒸蒸日上,开始出现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垄断竞争,首位攫得数据所有权的数字产业能够秉着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率先完成集中与垄断^[35],成为共同富裕路上的“拦路虎”。囿于相关监管制度与法规的出台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非公有资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易滋生盲目流动扩张的弊病,即在逐利逻辑的驱动下将数字平台作为野蛮生长的载体,藉由先补贴后收益的倾销模式迅速提升市场份额,快速形成垄断,进而重塑市场利益分配结构^[36],实现财富垄断的“赢者通吃”与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妨害市场竞争秩序,造就虚假繁荣与资源浪费,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无序扩张的非公有资本会侵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削弱人民的生活质量,拉大财富的两极分化,侵蚀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蕴。无序扩张的非公有资本在本性驱使下,往往倾向于剥削压榨劳动力,进而忽视乃至侵犯劳动者正当权益。诸多非公有企业为追求最大化利润,往往致力于通过“996”“007”工作制等手段,竭尽所能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提升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最大化透支劳动者的体力脑力,并尽可能压低劳动薪酬、克扣加班工资,导致劳动者的生理状况与实际生活水准严重下降。同时,随着非公有资本不断向住房、医疗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部分民生行业的消费属性悄然改变,逐渐偏离其社会责任与目标,住房、就医价格不断遭受人为抬升,为人民群众增添了沉重负担,大幅削弱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无序扩张的非公有资本会最大化攫取人民利益,造就两极分化。数字时代部分企业假借互联网金融之名实行更为隐蔽的利益攫取,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不断“割韭菜”,打劫人民群众的财富;部分企业依靠自身的市场支配地位与对客户大数据的垄断,对消费者实施“大数据杀熟”,在平台上进行歧视性定价、欺诈消费者……无序扩张的非公有资本在疯狂敛财的本性下会造就社会财富差距的愈拉愈大,成为共同富裕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三) 双轮驱动:以资本运行凝聚共富力量

共同富裕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亦非国家、社会、个人单向度努力能够轻易促成的目标。共同富裕在打牢富裕基础的同时更要把握好共同的原则,既需要做大“蛋糕”,亦需要分好“蛋糕”。公有资本能够带头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底盘,同时保障其共同属性,起到把方向、稳大局的作用;非公有资本则是国民经济的助推引擎,在引导之下能够成为分好“蛋糕”的补充力量。当前,各类资本如何形成合力促进共同富裕之实现,乃是新发展阶段的一项重大理论实践任务。

一方面,各类资本承担着不断为做大共同富裕“蛋糕”集聚力量的任务。就公有资本而言,应当充分发挥对经济建设的主导作用。公有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具备统领性的历史使命,理应在投入高、回报慢的基础民生、公共设施、科技创新等项目上担负起重要职责,以资本投入撬动民间投资,同时在自身保值增值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推进所在领域的技术、制度、管理创新,持续促动生产效率提升,以社会先进生产力引领者之身份为人民供给高质量产品服务,牢牢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就非公有资本而言,应当更好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效用。在新发展阶段,非公有资本理应享有在更为健全的市场体制、更为公正的法制环境之下健康发展的良好条件,通过破除现实发展中面临的要素流动不顺、经营支持不足等制约壁垒,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更高效地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更好地履行创造共同富裕物质财富的重大职责。

另一方面,各类资本承担着为分好共同富裕“蛋糕”各尽其责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资本,时刻不能忘记其发展初衷,即保障发展的普惠性、分配的公平性与成果的共享性,坚定不移地擎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大旗。就公有资本而言,要主动做好共富的“排头兵”。公有资本应当继续做好维护劳动人民合法权益的工作,在推动社会公平、保障改善民生方面进一步作出表率。同时,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力与影响力,藉由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等渠道引导非公有资本的发展方向,促使其合法运行、规范分配、服务于社会主义大局,从根本上矫正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航标,协调好各类利益主体间的分配关系,打造各阶层公平共享的社会格局。就非公有资本而言,要对标当好共富的“生力军”。当前,非公有资本的任务在于将自身逐利冲动限制于契合社会主义价值的构架之内,循照共同富裕的整体方向,在有效引导监管之下担负起共富职责,及时解决内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资矛盾、无序乱象,追求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相耦合的健康发展,强化收入分配的垂直流动性,使得自身原先刺激贫富分化的运作逻辑转化为服务共同富裕的运作逻辑^[37]。

三、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生产要素,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38]。要促进资本健康发展,就是要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既要利用资本促进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民生保障提标扩面,同时亦要极力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对共同富裕的消极作用。具体而言,针对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不同特性,主要可以从下述两大方面着手:

(一) 固本培元: 坚定维护公有资本主导地位, 发挥其领富效应

公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资本中的主导性资本,其天然优势决定了它在推动共同富裕上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使命。健康发展的公有资本是充分履行领头性职责义务、致力于为人民积累财富的资本。在新发展阶段,应当继续切实维护好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增进公有资本的民生担当,以公有资本引领混合资本的共富方向,使公有资本对标共同富裕的要求率先实现健康发展。

首先,夯实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筑牢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由于当前公有资本数量存在相对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与共富效用,必须着力提升公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以主体优势更好推进共同富裕。一是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应当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投资的比例与规模,提升国有资本的生产效率与积累速度,确保国有资本总量稳步增长。要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注重强化国有资本的整体效能,针对提升资本回报、优化资本布局、保障资本安全等方面加强资本监管,并全面推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强化国有资本之增殖本性,以提升其配置效率与扩张动力^[39]。此外,应当持续保障国有资本在能源、运输、金融、通信、粮食、军工等关涉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与关键行业中的绝对优势,筑牢其在专精特新、乡村振兴等战略场域中的引领力与感召力,加紧推动其突破集成电路、5G通讯、大数据智能等基础研究与尖端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增强国有资本助益共同富裕的效力、生命力与带动力。二是要发展壮大集体资本。积极推进集体资本的壮大与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与农民共富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大力推动集体资本在量与质上的同步提升,进一步创新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优化集体经济的治理体系,深化集体产权的制度改革,牢牢维护农民对集体资本的合法所有权,推进集体资本这一创富源泉的充分涌流,切实发挥其促动农民群体共同富裕的效用。

其次,发挥公有资本的全局调控作用,引领混合资本的共富方向。大力推动公有资本主导之下的混合资本发展,有利于结合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的各自优势,以非公有资本的作用弥补公有资本的总量不足,并使非公有资本在引导带动下主动将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目标,达到高效发展与分配公平间的内在均衡。为此,应当在除关涉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外大力促进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发展,打造公有资本主导之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通过直接出资入股、购买公有股权、实现公有股权与民间资本的置换等途径积极推进民营资本参股公有制企业,亦可以通过海外并购、投融资合作、离岸金融等途径合理推进外国资本参与公有制企业^[40],使各类资本能够一同参与共同富裕的战略擘画。同时,在推进混合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有资本的主导权,严格防范公有资本主导作用减弱、国有资本流失、非公资本单向参控、外国资本垄断等不良现象的出现,避免公有资本被私人利益绑架。

最后,要对标共同富裕的宏观导向,增进公有资本的民生担当。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公有资本在民生领域的公共属性。应鼓励公有资本加大针对社保、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公共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使其更好地成为公共利益的强大支柱,通过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继续提升国有资本预算资金转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以民生支出的比例,以国有资本持续补充社保基金、解决社会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同时推动其向中西部地区、边远地区投资倾斜,以增加就业、供给税收等途径使公有资本的发展成果更全面地惠及全体人民。此外,应推动公有资本在第三次分配中更好地发挥自觉主动性,同时为非公有资本

做好示范榜样,群策群力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二是应明确公有资本的劳动力产权,建立稳定的“劳资两利”利润分享制度。有必要推动公有制企业的收益分红,使劳动者有效共享公有资本利润增长的发展红利,即可以按照各类生产要素由产权和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以国有资产要素使用权、收益权为依据,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作为要素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实行公有制企业的全民分红^[41]。

(二) 扬长避短:鼓励引导非公资本有序发展,发挥其助推效应

由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使命初衷,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非公有资本,就是要以人民利益至上为基础性依托,推动其健康、理性、有序发展,既要为其提供更好的条件,使其能够充分服务于社会与人民,最大化发挥在繁荣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做大共同富裕物质底盘上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亦要借助一系列政策引导与监管安排,校准非公有资本为民利民的价值定位,秉持限制性发展的方针保障其发展的正确方向,避免滋生无序扩张的弊病,确保其始终行驶在共同富裕的正确轨道。

首先,要优化非公有资本发展的外部环境,推动非公有资本服务共富共享。一是要为非公有资本发展提供良好外部条件。应充分激发非公有资本的属性与作用、鼓励非公有资本的发展壮大,筑牢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首先应当着力改善市场整体营商环境,在一般性竞争领域为非公有资本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突破阻隔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垄断与市场障碍,打造公允且统一的监管标准,尽快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细则,将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上法制轨道,促进“非禁即入”全面实现,形成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42]。同时,应当着眼于打造有效产权激励机制、收益分配激励机制,在正当经营与服务共富共享的基础之上坚定保障非公有资本的产权,充分维护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体系,使非公有资本的活力、竞争力与创造力极大迸发,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与国家物质财富的新增长。二是要强化非公有资本的共富属性。应当不断优化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出台更多优惠、吸引政策,打造有利于推动非公有资本到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倾斜性政策体系,有序实现非公有资本同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重要民生战略的对接,使非公有资本为改善落后地区的投资就业环境、助力民众共富共享作出应有贡献。

其次,要规范非公有资本在民生领域的发展方向,有力有效保障民生福祉。必须引导非公有资本健康发展,使其行为与民生福祉相对接,与增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结。必须着力于增强民生领域非公有资本运行全过程的公益性、人民性属性,在充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运行原则、人民群众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加大有效投资,不断提升非公有资本的投资质量和社会效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等总体原则,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遏制非公有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重要民生领域的过度商业化,实现发展方向朝着人民福祉的价值复归,以保障人民群众能够无障碍享受社会公共服务及产品。

再次,要强化对数字时代非公有资本的监管力度,确保共富之路行稳致远。坚持反垄断,实施合理限度内的监管,保障数字时代各种形态的资本能够享有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是维持非公有资本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共同富裕的航向正确、航线不偏的必要条件。一是应顺应技术变革趋势,加快修改完善新形势下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相关法律法规。要不断完善全方位竞争监管法规,划清规则底线,对有关垄断、非法竞争活动予以严惩,为市场主体予以明确预期。二是要充分认识数字时代出现的新型数据垄断、技术垄断及行业垄断等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重点现象,予以新型式监管。针对数字时代存在的新型非公有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如“大数据杀熟”“扼杀式并购”“二选一”以及强制交易、流量挟持等操作,必须前移监管关口,配套推出新型认定条件、判别标尺及惩处梯次等,健全预防性监管措施,构筑全程式、前瞻式新型监管制度^[43]。三是针对数字平台的非公有资本活动,应推出线上线下、内部外部同步监管的“组合拳”。加快建设数字服务平台第三方信用机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方面的有效作用,努力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44]。四是应当遵循“设灯

有据”及“灯树要少”的原则设立规范非公有资本发展方向的“红绿灯”。既要保证设置的“红绿灯”有科学合理的界限、清晰透明的规则、易于判断的标准;同时有意识地控制“红绿灯”总数,确保设置“红绿灯”的权力来源于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避免出现部门性地方性特权^[45]。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创造,2022,(7).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张雄,张柏川. 马克思对资本范畴本质的揭示. 光明日报,2021-04-26.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刘洪才. 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 [18] 王治东,谭勇. 马克思物化理论的三重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2).
- [1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真相. 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 [20] 习近平.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人民日报,2022-05-01.
- [21] 王宏波,曹睿. 公有资本范畴的生成逻辑、实践成就与时代价值.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22] 2021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2022-01-27.[2022-10-30]
<http://www.sasac.gov.cn/n16582853/n16582888/c22940505/content.html>.
- [23] 国资报告:独家解析2021年度《财富》世界五百强上榜国企名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2021-08-02.
[2022-10-30]<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20045407/content.html>.
- [24] 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指数(2020)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国家示范社2020年经营收入均值1514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2022-01-22.[2022-10-30]http://www.moa.gov.cn/xw/zwdt/202201/t20220122_6387449.htm.
- [25] 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2022-02-25.[2022-10-30]http://www.moa.gov.cn/xw/bmdt/202202/t20220225_6389728.htm.
- [26] 庞庆明. 试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公有资本与私人资本. 教学与研究,2018,(10).
- [27] 100%! 国资央企248个定点扶贫县全部脱贫摘帽. 中国青年网,2020-10-24.[2022-10-3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221915018869201&wfr=spider&for=pc>.
- [28] 新华社: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2021-01-13.[2022-10-30]<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9/c16507437/content.html>.
- [29] 邱海平. 关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几个理论问题. 经济学动态,2022,(7).
- [30] 统计局:200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 搜狐网,2010-01-27.[2022-10-30]<https://business.sohu.com/20100127/n269853983.shtml>.
- [31] 李济琛. 民营经济与中国现代化. 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
- [32] 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网,2022.[2022-10-30]<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 [33]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4] 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2021-12-23. [2022-10-3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900144303583869&wfr=spider&for=pc>.
- [35] 姚聪聪. “资本无序扩张”: 样态透视、实质批判及治理策略. 新疆社会科学, 2022, (4).
- [36] 何德旭, 谭洪波. 规范资本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光明日报, 2022-07-05.
- [37] 刘长明, 董庆强. 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察. 当代经济研究, 2021, (12).
- [38]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2-04-30. [2022-10-30]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8.htm.
- [39] 李楠, 王继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探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8).
- [40] 邹升平. 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与实践路径. 广西社会科学, 2022, (1).
- [41] 程恩富, 伍山林. 以国资收益全民分红的方式促进共享共富. 海派经济学, 2021, (4).
- [42] 李松龄. 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及理论逻辑. 贵州社会科学, 2022, (5).
- [43] 张杰, 王媛媛.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资本无序扩张现象、成因与对策.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2, (3).
- [44] 肖潇. 正确认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4).
- [45] 蔡之兵.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与政策逻辑. 改革, 2022, (6).

An Analysis on the Capital Logic and Path Of Achieving Common Affluence

Li Nan, Li Yunl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capital takes on not only the value of pursuing proliferation, that is, capital generality, but also a certain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that is, capital particularity, with a dual natu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rections. The capital of socialist countries falls into the economic category that embodies the unified provisions of Marx on the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apital. Among them, the ownership of public capital belongs to all the people or the collective, which is the ballast cornerstone of common prosperity; Non-public capital, a capital with private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essence, can not only provid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may expand disorderly due to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livelihood orien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 it is the key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property of capital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aggregate the joint forces of all kinds of capital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we should continue to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o serve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uphol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capital, exert its global regulatory function, enhance its responsibility for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fully demonstr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leading common af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capital, guide it to serve people's well-being, firmly curb its disorderly expansion, and fully demonstr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facilitating common affluence.

Key words public capital; non-public capital;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mmon affluence

■ 收稿日期 2022-12-04

■ 作者简介 李楠, 经济学博士,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2;
李昀励,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杨敏